

“奥普拉现象”对美国文学学术的批判与启示

周郁蓓

内容提要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文学阅读热潮。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利用其主持的节目对推荐作品进行专题讨论，用充满道德内涵的反文学学术和反意识形态的煽情性文学言说方式，激励观众和读者的人生信念。奥普拉的成功，反衬出美国文学学术研究存在的学术与大众疏离、政治与道德割裂、理性与感性分离等问题，从正面和反面为美国文学学术的改良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奥普拉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 美国文学学术

在电视、网络等电子娱乐形式一统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 20 世纪末，一场文学阅读热潮在开电子娱乐先河的美国盛行一时。而这场热潮的始作俑者既不是以文学为业的学者，也不是以利益为指针的出版业，而是与美国文学原无多少瓜葛、被誉为电视领域最成功女性、有脱口秀“女神”之称的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Oprah Winfrey）。奥普拉所主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依靠其个人“品牌”的魅力和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使文学阅读成为广大电视观众的新时尚，它在给出版界带来巨额利润、给奥普拉品牌增色添彩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到了文学领域之中。一枚至少值 50 万册销售量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印章，象征着奥

普拉对文学学术权威的颠覆和文学学术权威在大众文化领域内的缺失或消解。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奥普拉对大众文学阅读时尚的引领，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典型的商业市场功能，成就了出版业文学发行的利润梦想，同时，也履行了一种社会使命和责任，填补了因文学学术的大众服务功能不断弱化而留下的空间。奥普拉的成功是由其商业智慧、品牌形象、迎合大众的导读方式和社会使命感共同创造的，但也不妨说是被用高度规则化的学术语言和思辨方式言说文学的美国文学学术所成就。当代美国文学学术研究的缺陷与弊病在与奥普拉现象的比照中暴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后者构成了对前者的批判和启示。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效应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以现代传媒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依托，充分运用偶像崇拜心理，引导大众参与文学阅读，让大众体验文学阅读的快乐。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奥普拉的影响力，无论是拥有文学话语权威的文学学术界，还是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的出版业，均望尘莫及。奥普拉推荐的作品往往轻而易举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俱乐部首部推荐的小说《失踪时刻》(*Deep End of the Ocean*)销售量一度达 90 万册，第二本推荐小说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的销售量则曾达 140 万册。2003 年 6 月 18 日，“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在 2002 年 4 月暂停活动后复出，改变了过去只推荐当代作品的原则，选中斯坦贝克的《天伦梦境》作为其复出后的首部推荐作品。而这部作品仅半个月就出人意料地销售了 75 万册，同此前许多奥普拉推荐的作品一样，跃升至《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连一向冷清的“国家斯坦贝克中心”博物馆，也成为一时的热线中心。福克纳的三本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在 2005 年夏季经奥普拉推荐后，也销出 30 万册。2005 年底，俱乐部推荐的詹姆斯·弗雷的回忆录《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销量更是窜升至 350 万册，名列 2005 年度最畅销书榜第二位。

奥普拉不仅创下发行壮举，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读书俱乐部热潮。据统计，1999 年，美国的读书俱乐部增至 50 万个，是 1994 年的两倍。这些俱乐部在选材、讨论模式等方面，全面模仿“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在不同的社区乃至大学校园，形成了

以文学为凝聚力的读者群体。同时，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读书俱乐部，成为电视节目追随的时尚。“今天”、“早安美国”、“里吉斯与凯莉脱口秀”等节目都相继添加了以读书俱乐部为名的文学讨论内容；不少大众杂志也开始以读书俱乐部的形式推荐文学书目。这些读书俱乐部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例如，成立于 1999 年、以推荐黑人文学作品为主的“黑人表达读书俱乐部”，2001 年的会员人数超过了 25 万。

奥普拉的推波助澜，使美国的 21 世纪在读书俱乐部热潮和文学阅读时尚中拉开序幕。这一时尚，标志着新世纪的文学更加世俗化，但另一方面，纸介书文化的复归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世纪添加了传统元素。我们无法预知 21 世纪的大众文学行为是否将意味着肤浅与理想、商业与责任的并存，但是奥普拉以商业行为“拯救文字”的社会积极意义已得到肯定，她屡获新闻界和社会文化机构嘉奖的事实便可以证明。作为美国《时代》周刊 1996 年度 25 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 50 周年纪念金质荣誉奖章获得者，以及称 20 世纪末为“奥普拉时代”的美国《新闻周刊》21 世纪第 1 期的封面人物，奥普拉在不少社会媒体和文化机构的眼中，无疑已成为新一代的文化使者和文学传播者。

以文学为主的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

在奥普拉一路占领文学市场的同时，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美国人文研究和教育，却正面临严重危机。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英语学科博士点因人才市场和经费问题大大减少。1996 年，即“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成立当年，美国国会决定停止向曾经为人文研究和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人文基金

会”提供资金，这暗示了曾经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文研究和教育，在国家语境中失去了受宠与被庇护的地位。事实上，美国英语学科所面临的“资源缩减、英语职位难求、文学教授被（写作专业）围城”以及“派别纷争”等危机，早在90年代之前就已彰显。20世纪80年代，为寻求应对之策，在现代语言协会倡导下，专业未来委员会由各大学英语学科协作，开展了一项长达近十年的学科自我检审、自我展望的调研活动。活动终结时，参研者们认为，构建学术新联盟的光明未来已初见端倪，为此他们对学科前途充满了“谨慎的乐观精神”。随后的1987年，作为这次活动之延伸的全美80所大学英语博士点的负责人会议，达成了“不以历史覆盖法和正典统一作为指导学科课程构架一成不变的参考依据”的共识。此后十年，英语学科以理论为基础与手段，以突破典律囿限为目的，以研究话语结构和策略、探索符号指向系统和人类主体系统的关系为内容，将学术推向政治化和理论化极限，将传统人文观点挤向边缘，弱化了学科的人文本质。上述1996年的国会决策将人文学科进一步推向无立足之地的境地，这一方面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言，是国家体制对精英文化一贯敌意的集中体现，是美国传统的反智主义的最终胜利，但另一方面，这无疑也是对美国英语学科十年发展成果最具批判性的间接点评，是对人文学科人文作用的质疑，揭示了以政治化学术为主流、以理论为共性的英语学科繁荣景象背后所隐藏的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文学学术界内部传统派与激进派的论战，在激进派稳定占据主流地位、并步入怀疑主义与相对论极端之时，重又进入白热化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传统人文学派以非理论化和非学术套语式语言、以少用引文和注释的方式言说主流

学术危机，并在初尝了文学学者E. D. 赫施（《文学评论》，1987）以及以文学为专长的政治学学者阿兰·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等人在学术界之外的发行成果之后，再次以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可朽作品》（1994）一书以及其中一份长约400部作品的西方经典著作书单，将传统学派在学界之外的声誉推上高潮。但是，如果说激进派日益笼罩在不断浓重的政治意识色彩之中，沉浸在学术语言、学术理论的晦涩、抽象与高度的形式感中，被学术边缘化了的传统派，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借大众之众获得言说学术的权威性，摧毁主流学术话语的统治地位。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著的事实，使布鲁姆赋有人文使命的专著具有了浓重的商业成分。传统派面向大众、将学术论争延伸至学术界外的学术言说，在传扬人文理念的同时，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理念也并非有容乃大，对于普通大众，更非人人适用的精神营养。正因为如此，传统经典的出版现实并未因传统派学术论著的畅销而得到改变，传统经典的阅读热潮也并未因此而到来。以此看来，即便传统派实现了对激进派的最终颠覆，夺取了学术话语权，但如果不突破学术政治的局限和关涉大众的思维定势，美国文学学术若要与大众娱乐文化相抗衡，替代奥普拉式的人物成为能够激励大众的文学使者，实现超越奥普拉内涵的文学革命，仍将困难重重。

奥普拉的大众文学观

在美国文学学术界面临危机并日益疏离大众时，文学根基并不深厚的奥普拉利用自己强烈的文学感性体认，利用接近大众的最有效媒体工具以及以大众为言说对象的职业

便利条件，轻易地感召了大批文学读者。在“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两大活动即推荐文学作品和作品专题讨论（奥普拉脱口秀节目的一部分）中，奥普拉与美国文学学术背道而驰，但却大获成功。

在类似大学讨论课的作品讨论专题节目中，奥普拉作为讨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扮演了导师、知音和行为典范的三重角色。她以普通读者的身份，从言说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入手言说文学，在毫不掩饰自己底层社会背景的同时，展现文学在她自身精神素质和道德品格形成过程中的助益作用。底层背景和由个人言及文学的方式，既缩小了作为公众名人的她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又通过她家喻户晓的自我奋斗典范形象，让观众体察到了精神素质和道德品格对于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文学对个人成功的重要性。以此为铺垫的启发式提问，以通俗语言为媒介，将言说主体从奥普拉转向观众，继而将对文学的言说转向对观众个人经历的言说，将观众的文学阅读延伸为对自我的阅读、对现实的阅读和对生命的阅读。文学在观众倾吐分享个人经历、抒解胸中之痛的畅快过程中，间接起到了拯救自信心或挽救精神的积极作用。对观众个人产生了特殊意义的文学，最终成为奥普拉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超乎利益关系的聚合力量。颇具个性魅力和巧用名人权力的奥普拉所构筑的跨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读者群体，无疑承载着奥普拉个人的商业动机，成就了出版业的巨额利润，具有必然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内容。但是，奥普拉拒绝出版作品导读、拒绝销售推荐作品的去商业化举动，以及她以挽救集体为目的的“让美国回归阅读”的“乌托邦冲动”，消减了她个人与读者关系当中的利益成分，使她与读者之间以个人经历再述为主的文学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心灵的沟通和思想的共享，转化为一种社会凝聚

力。奥普拉完全囿于私人微小叙事层面的文学讨论，一方面是对文学普适性和普世性的认可，另一方面，在超越意识形态话语的交流中，使读者超越了完全被动的消费者的含义，超越了詹明信所说的后现代大众文化市场“再消费消费过程本身”的纯消费特征，参与行使了再造文学文本意义的自然权利。

如果说奥普拉通过作品缔造了读者群体，被奥普拉转化为公共领域交流平台的作品讨论，也使被当代文学理论置于作品意义再构建过程之外的作家，纳入到他本人作品意义的再阐释过程之中，使大众诠释视野和作者视野得以聚合。奥普拉邀请作家本人参与其作品的讨论，的确将作家纳入大众文化的市场体系之中，掩盖了奥普拉与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包含着利益内涵的对作家权利的维护，同时也是奥普拉对作家情感投契的表现之一。奥普拉曾多次表示，参拍电影《紫色》与玛雅·安吉罗和莫里森的晤面是她一生之三幸。如此看来，“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成立绝非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而是奥普拉对作家和文学积蕴已久的心仪之情的释放。如果说对作家的主动亲和，是奥普拉对文学感性体认的延伸，是一种情感和知性满足，那么，奥普拉与作家的关系，就具有了超越利益的内容，因为，纯粹的利益关系必定意味着情感成分的残缺，包含着将对对方彻底工具化的初始动机。

正是对作家与文学的情感体认，使奥普拉的文学言说充满煽情之语，使她的读书节目格外动情。但是，奥普拉的煽情与言情，由于充满了道德内涵、背负了挽救精神的使命，拒绝了颓废、厌世、讽刺、戏谑等消极内容，所以又具有了着眼于普通民众的现实主义成分，这种含有反通俗意义、类似于心灵仪式般的通俗之举，反倒成为她深得大众之心的关键。奥普拉煽情性的文学言说，与

她完全以作品对她个人的情感震慑力以及作品对她个人兴趣的激发来选择作品这样一种文学判读方式相辅相成。奥普拉坦言：“如果一本书不能在前 50 页打动我，我就选择放弃。”^④这种判读方式，使文学学者被奥普拉隔绝在她本人与作者和读者以作品为桥梁而建立起来的多重关系之外，完全相悖于美国“每月好书俱乐部”等著名传统读书俱乐部聘文学学者为专家顾问的惯例。关于此点，批评家伍德贝瑞认为，文学与特殊训练无关，理解文学只需要“个人经历、同情心与想像力”以及一颗“活着的灵魂”，所以有助于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文学所凝聚起来的并不是以文学为业的学术群体，而是精神群体。^⑤可以认为，奥普拉的读者群体既是消费群体，也是由她所选择的作品凝聚起来的精神群体。奥普拉对文学的感性诉求，使她所选择的小说，无论被学术语言定义为通俗还是经典，皆为叙之有情、类似人生境遇真切记录、以女性人物见长的生存故事。在奥普拉以相类作品构建情景式集体文学阅读语境、并在此语境中关照个人人生的过程中，文学学术非此即彼的分类法失去了意义和作用。

奥普拉在构架作品系列、激发个人参与、经营集体共享、实现精神挽救等实效文学行为中植入的平民趣味和商业动机，蕴涵了道德精神内涵、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因素。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学学者伊娃·伊鲁兹认为，奥普拉以“道德说教”为核心的商业文学行为，“至少为重建具有聚合性和稳定性的当代生活提供了一个叙述框架”。^⑥而美国文学学者西西丽雅·法尔则把奥普拉的文学行为称为以实效方式调和个人自由和公民美德冲突关系的“文化民主”。^⑦法尔认为，这种文化民主使得奥普拉“把美学价值建立在个人选择之上”。^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奥普拉平衡商业与道

德、集体阅读与个人精神救助的民主文学行为，并未能在挖掘作品意义和重构作品语境中获得深与浅、宽与窄的平衡。奥普拉的作品讨论在拒绝受益于文学学术批评的同时，重复了在一些没有文学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身上较易出现的作品简约化解读倾向。奥普拉对作品所承载的美学价值、社会矛盾、历史语境等深层次意义的忽略乃至剥夺，标志着她与美国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在人文思想以及知识层面难以弥合的鸿沟。但是，奥普拉以简约化导读方式成功创造大众文学阅读热潮的事实，又意味着大众读者的文学激情未曾泯灭，意味着大众对文学阅读的精神渴求仍然存在，故此，奥普拉现象也折射出美国文学学术研究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文学学术界并未真正设法弥合、甚至刻意创造的鸿沟，意味着大众的文学激情和精神渴求在文学学术成果中未曾得到呼应和满足。

由奥普拉现象反观美国文学学术研究

由于文学主流学者眼中的奥普拉是介入文学界的“外行”，所钟情和擅长的是言情式作品、煽情式的导读，只适合“服务于中产阶级平庸趣味中的崇高思想”，^⑨与严肃文化和深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文学学术界对于奥普拉文学行为的研究，也大大落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追踪解析奥普拉现象的新闻界和社会学界：出自文学学术界的相关论文数量极少，相关专著迟至 2005 年才问世（《和奥普拉同读：改变了美国的读书俱乐部》与《读解奥普拉现象：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阅读方式》），^⑩而且这两本专著也均非出自主流学者之手。学界精英对奥普拉的藐视甚至演化成了某些文学学者对印有“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印章之作品版本的坚决抵制，^⑪

2001年9月,“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作品《修正》(*Corrections*)的作者乔纳森·弗瑞森(Jonathan Frazen)就公开拒绝该荣誉。

显然,美国文学学术既无意承担激发大众文学激情、激励大众人生信念的世俗责任,又无法直面该责任落入并非意义和真理创造者的世俗人手中的事实。美国文学学术发展使文学批评不断学科化、知识化和技术化,其最初的思想动机就是在学术与世俗大众之间筑就鸿沟。美国文学学者托马斯·斯崔沙兹指出,美国文学学术的起始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相伴相随。现代主义文学以幽闭、厌世和讽刺等方式应对物质道德沉沦和文学庸俗化倾向,以此守护纯文学;与之相仿,当时兴起的美国文学学术也试图排斥、隔离甚至消除日益得人心的大众通俗文化,以坚守精英文化阵地。^{①9}文学学术的构建和发展在此动机驱使下,无心也无意对精英学术文化如何与大众通俗文化沟通、精英学术文化如何助益大众等问题进行前期设想和预后思考。因此,美国文学学术的高度发展,既意味着文学意义和文学思想的阐发正走向极端理性高度,也意味着文学学术不断走向幽闭,走向对自然情感体验与简单道德价值主题的藐视和无视。美国文学学者罗斯·珀斯诺克指出,美国的文学学者既继承了威廉·詹姆斯视知识分子为拯救美国社会之根本力量的精英主义思想精髓,又重复了詹姆斯把面向同行的个人著述等同于社会参与的思想缺陷。^{②0}事实上,20世纪后期的理论膨胀,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关于民众权利和民众主体等问题的文学言说异化为对理论、理论家以及理论冲突的陈列和分析,学术著述由此成为狭隘意义上的圈内对话,个人学术成为对圈内流行学术思潮的契合和迎合,学术论争成为纯派别论争,文学批评对社会现实以及隐蔽的权力政治结构的批判式剖析

演化成一种理论政治。这些事实表明,20世纪后期的美国文学学术,已经在一定意义上窒息了文学学者个人思想的自由、独立和原创性,因而也消解了它创造和守护超越性意义和精神的初始动机。

事实上,美国文学学术固守精英阵地的动机早在物质化、市场化以及生存需求等世俗力量的巨大作用下发生了本质异化。如果说初始的美国文学学术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根基上不乏相通之处,当今的美国文学学术文化则是大众文化百态乃至物质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缩影。正如戴维·沙姆维所说,当今的美国文学学术文化其实无异于大众文化的名人明星文化,学科成果的量化以及学科内部的高度竞争,将重量级刊物成果数量可观的学者推上明星位置,学术会议、名牌大学的重金聘邀等等,更是在造就了学者明星的同时,将明星学者转化为符号资本,筑就了学术界内部的等级制和权威制。而普通学者的学术研究又通过对明星学者理论与大名的重复,巩固了这种等级制和权威制,瓦解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创新性。^{②1}文学言说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学科和学者个人谋生立身或成就事业的手段。文学学者精英文化因此可以说既有大众通俗文化的根本特征,又有物质商品文化的根本属性,其精神与思想层面的精英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已无法与功利性相分离。因此,美国文学学术对有形的大众以及大众文化的疏离和否定,即是对自身大众性的无视和否定。

以创造意义为目的的美国文学学术不仅渗透了大众文化的烙印,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自始至终具有介入性和功用性,其所创造的意义无论对于保守派还是激进派而言都是服务于民主政治理想的。早期美国文学批评出于政治和文化需要,视文学批评为建构和承载民族文学思想、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守护、阐扬、改进和完善民

主体制的重要力量，而以走向政治极端为终结的 20 世纪美国文学学术，也是批判、诠释、改造和创新美国民主理念的实践活动。美国文学学术史表明，摒弃语境含义的新批评并未长久地大行其道，短暂的异彩之后很快被之后的文学批评所沿用，转而成为协助文学批评更出色地完成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功能的有效工具；文学学界以及美国学界很少青睐爱伦·坡等不以明显民族地域为作品背景的作家，对于超越美国地域视野的普遍人性、情感等普世性主题也较少关注。20 世纪后期，美国文学批评变异为不具审美作用和道德内涵、只具认识作用的纯粹政治性批评。但是，即便美国文学学术自始至终具有的为美国民主理想信念服务的民族实用目标具有一定的崇高性，它还是因缺乏道德层面的内涵和关怀、缺乏大众这一文学的基本主体和视野，难以成为真正介入社会、促成社会革命的批判者。的确，如果说爱默生的“个人思想及创作乃社会行为，创新及独立乃社会革命源泉”的观点仍然成立的话，威廉·詹姆斯因其原创思想仍不失为积极的社会行为者，奥普拉也因充分借用感性自由来实现道德救助而成为一场革命的创造者，但美国文学学术却因思想自由和创新意识的不断减少、与大众的不断疏离，对社会和大众失去了人文或智识的导引作用，让思想无以转化成行为，故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使得开创 20 世纪末文学阅读新局面的成果，轻易落入反意识形态和反文学学术、但却充分享用个性和感性自由的通俗文化领军人物奥普拉之手中。

结语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现象，如若反衬了美国文学学术的短与长，也可以成为美国

文学学术开创未来的启示。奥普拉现象显示，美国文学学术面临着重新书写新的文学学术语言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最大困难并不是进一步将自身推向理性，并不是以传统观替代激进观，也并不是以经典典律取代族裔典律，以这种取代方式对文学学术的再书写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以挽回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守。事实上，面对文学学术所面临的内外危机，美国一些文学学者已经提出了超越派别、超越对立的全新学术视角。美国文学学者卡尔·伍德仁提议，新的学术语言应该是学术与大众、政治观与价值观、理想与现实、美学与政治、相对论与坚定信仰之间的桥梁。^②美国文学学者倪奥·鲁西针对理性已非人类启蒙之道而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控制的工具这一现象，更激烈地呼吁，文学学术应该首先去学科化，在不排斥政治视野的条件下，“把道德结论看成是一种美学或文本行为”。^③珀斯诺克也提出了类似的构建新美学标准的呼吁。^④这些观点与奥普拉现象一起为美国文学学术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延续美国两党民主政治模式、从而激发论争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哈贝马斯所说的基于理性思辨之上的共识；如何协调市场与文学、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娱乐性与教育性、批判与建设、学理分析与经验情感体认、时代性与无时代性、普世性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使学术在创造新思想的同时能够在精神沙化的社会中净化世道人心，将作为文学生命源泉的普通人置于学术视野之中。但是，这些学者同多数理论家一样在提出问题、描绘蓝图的同时，也没有解决问题与矛盾的具体方法，在此，无论其意义是正面还是反面，奥普拉现象也许可以作为文学学术的一个参考。至少，面对诸如霍桑、库柏、马克·吐温、惠特曼、德莱塞等等美国经典作家以及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等英国文学巨匠

都曾经是各自时代深得大众之心的通俗作家这样一个事实, 新的美国文学学术语言, 也可以像奥普拉一样深入大众和通俗之中, 将大众文学渴求纳入考察视野, 通过对当代通俗作品的细考, 发掘其中的优秀之作, 助之成为传承后代的经典, 从而超越奥普拉, 充分发挥学术的人文作用。

David Mehegan, "Oprah, Book Clubs Help Readers Find Their 'Eden'," in *Knight Ridder Tribune Business News*, 3 July 2003, p. 1, p. 1.

Daisy Maryles, "Behind the Bestsellers: The Oprah Scorecard," in *Publisher's Weekly*, 21 April 1997, p. 18.

- ⑪ D. T. Max, "The Oprah Effect," 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6 December 1999, p. 36, p. 36.

Richard Lacayo, "Whatever Happened to Last Year's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ime*, 21 April 1997, pp. 70 - 71.

Andrea Lunsford, Helene Moglen and James F. Slevin, *The Future of Doctoral Studies in English*,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9, p. v, p. vi.

John Guillory, "The Ordeal of Middlebrow Culture," in *Transition*, 67 (1995), p. 82.

江宁康, 译者前言, [美]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⑫ R. Mark Hall, "The Oprahfication of Literacy: Reading 'Oprah's Reading Club'," in *College English*, 65: 6 (2003), pp. 646 - 667.

- ⑬ George Edward Woodberry,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merica i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 ⑭ Eva Illouz, *Oprah Winfrey and the Glamour of Misery: An Essay o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3, p. 76.

- ⑮ Cecilia Konchar Farr, *Reading Oprah: How Oprah's Book Club Changed the Way America Rea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99, pp. 101 - 102.

- ⑯ "Book Publishers Mourning the End of the Oprah Book Club," in *The Journal of Black in Higher Education*, 36 (Summer 2002), p. 69.

- ⑰ Kathleen Rooney, *Reading with Oprah: The Book Club That Changed America*, Fayetteville, Arkansa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5. 第二本书见注⑭。

- ⑱ Thomas Strychacz, *Modernism, Mass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 - 7.

- ⑳ Ross Posnock, "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 and the Fortune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3: 3 (1991), pp. 566 - 587.

- ㉑ David R. Shunway, "The Star System in Literary Studies," in *PMLA*, 112: 1 (1997), pp. 85 - 100.

- ㉒ Carl Woodring, *Literature: An Embattled Profess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1 - 93.

- ㉓ Niall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 227.

[作者简介] 周郁蓓, 厦门大学副教授, 博士, 论文曾发表在《文史哲》, 美国《African American Review》, 《Extrapolation》等杂志和文集中。

责任编辑: 严蓓雯